

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及其同古典经济学的四个决裂

——德国柏林工业与经济学院海里希教授访谈

■ 魏小萍



◎马克思

采访者手记：米歇尔·海里希(Michael Heinrich),男,1957年生,德国柏林工业与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。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、政治经济学说史,以及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。同时,他还是《PROKLA 批判社会学》杂志的主编。作为德国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研究者,他的研究自始就与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历史考证版(MEGA)有着天然的联系,其流传最广的成果是他为《资本论》三卷本撰写的导读。该导读出版十多年以来,已经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。在这部导读中,海里希教授对《资本论》三卷本从当代视角进行了系统的解读,并且提供了马克思创作《资本论》的学术背景和政治背景。与以往人们强调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同,该导读强调马克思研究中的货币理论,这对于我们理解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。

尚没有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明确解释。

海:是的,但这是科学的常态(通常路径)。必须注意的是,至今我们也不拥有马克思所有的文本,比如即将在MEGA2第四部分出版的那些摘录,其中的大多数,之前并未出版过。这些摘录,对于我们真正深入地理解马克思的著作是非常重要的。根据这些新的文本,我们对于先前熟知的文本的理解也会发生变化。讨论尚在进行之中。我不认为会有一个最终的点,在那里所有人都达成了一致。可能会出现某种聚合,或许有些问题能够得到解决,但是依然有少量的问题将继续存在不同的解释。

采访者:是否存在对马克思的基本解释被大多数接受的例子呢?

海:几乎所有论断都至少会被一些人质疑。比如,在我的第二本书,即对《资本论》三卷的解说中,我尽量贴近《资本论》的文本。我只是想让初学者能更容易地理解马克思的文本,而不想去作大量的解释。而且,当我对某个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时,我同时申明: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观点。即便如此,这本书还是受到一些人的批判,他们说这里或那里是错误的。

我们可以说的是,现在关于马克思理论的讨论(至少其中的部分讨论)比三四十年前要精确得多。虽然没有一个能为几乎所有人都接受的结论,但这并不等于没有进步。我们阅读和讨论文本的方式就有进步。

采访者:我对“价值”概念很感兴趣。(刚才)您也已经提及“转形问题”。有许多论文和书籍是关于这个主题的,也有非常多的解释。您说引起这个问题的,是政治经济学的旧原理而不是马克思的新方法本身。您是否可以对此作出进一步的解释?

海:您知道古典政治经济学(斯密、李嘉图等)的话语。在核心问题上,马克思同旧的话语进行了决裂,但与此同时,在某些特定的点上,他依然被旧的话语束缚着。决裂进行得并不彻底。

采访者:马克思进行了何种决裂?

海:在我的第一本书《价值科学》中,我试图说明(马克思)与旧的话语体系在以下四个方面的决裂:(1)人类主义;(2)个人主义;(3)经验主义;(4)非历史主义。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中,首先会遇到“人类主义”。它是一种特定的人类学,它把人类的本质看作是自然的。例如,亚当·斯密有一段著名的文章讨论人与动物的区别,他认为,动物可能会为了什么东西争吵,但只有人类能够进行交换。斯密总结说,交换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属性。因此对亚当·斯密来说,商品所有者就是人的本质。而且,对斯密而言,充满商品所有者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社会的自然形式。青年马克思继承了某种人类学,而这种人类学对斯密的人类学持批判态度,它在某些方面是对斯密人类学的否定。但是,在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》和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中,马克思不仅批判了斯密的人类学,而且批判了有关人类本质的一切观念,批判了所有人类主义。因此,第一个决裂就是与人类主义的决裂。

第二个决裂是与我所说的“个人主义”的决裂。“个人主义”的观点是:必须从个人出发来理解社会。你必须首先理解个人的属性;然后你才能理解他们的行为,而后才能理解作为这些行为的结果的社会。这个观点不仅是斯密和李嘉图的核心,而且对新古典经济学来说是如此,对马克斯·韦伯的社会学也是如此。在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》中,马克思明确表达了相反的观点:“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,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。”因此,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的,而是个人之间关系的样本。理解社会必须从“关系”出发,而不能从“个人”出发。

采访者:这有什么区别吗?“关系”总是个人相互之间的“关系”。这是否仅仅是观点或视角上的差别?

海:不,我不这样认为。它远远超出了观点和视角的差别。“关系”的确是个人之间的“关系”,但个人并非固定不变的。若你持有与斯密或青年马克思相类似的人类学的观点,你会说:个人就是如此这般。但当你从“关系”的视角出发,在你开始讨论社会之前是不能对个人作出任何言说的。举例来说,新古典经济学家非常宽泛地运用个人主义。他们声称:个人都追求效用的最大化。从这个最大化进程中可以推论出其他的一切:与自然的关系,与劳动过程的关系,尤其是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——很快,交换关系从效用最大化中衍生出来了。当我们严肃地考察马克思的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》时,其中并没有这样的、适用于个人的一般原则——原理,既没有最大化原则——原理,也没有其他原则——原理。有不同的社会模式,在不同的社会模式中就有不同模式的个性,适用于所有社会的个性(就像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个人)并不存在。因此,你必须从社会模式和生产方式出发,而不是从个人出发,来开始你的分析。社会的模式规定着个性表达的特定方式。因此,是社会、社会的模式,而不是个人,规定着个性、个性模式。

采访者:这是非常典型的马克思的观点。

海:是的。我认为,在此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的方法与许多“资本主义的”经济学和社会学方法之间的重大分歧。马克思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才具备了这样的见地。他清晰表达这一方法的第一部手稿是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》。之前,比如在《共产党宣言》和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中,他都没有明确这一分歧。

采访者:那么,个人在社会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?

海:我们必须对个人和个性的发展可能作出区分。为使问题更加清楚,我们可以举例说明。这个例子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“商品的拜物教性质”那一部分的一个脚注中也用过。那里,他提到堂·吉珂德,塞万提斯经典小说里的著名人物。堂·吉珂德生活在17世纪早期,他看了如此多的有关骑士以及骑士的冒险(他认为是真实的)的小说,以致他自己也成为一名骑士,能够穿上中世纪骑士的盔甲,骑着马周游西班牙。堂·吉珂德的冒险,我们听起来非常滑稽,这主要源自误解。为何听起来滑稽?堂·吉珂德想实现一种属于中世纪个性的模式。他的所作所为在中世纪还有些道理,但在17世纪的“后中世纪社会”里,就显得疯狂、愚蠢。社会结构规定着普通的、正常的个性形式。在这一社会中生活的人们,通常把这些形式看作是“自然的”。但是在二、三百年之前,个性的形式存在很大差别,因为社会存在差别。我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是由社会决定的,人们可以选择。而堂·吉珂德正想实现一种与他所处的时代的通常形式不同的个性形式。但是社会会认定你是一种愚蠢的、甚至是疯狂的方式作出自己的反应,这时你会成为一个局外人。如果你想避免此类事情发生,你必须以个性的通常形式来约束自己。

如果我们想以一种科学的方式分析社会,我们必须从它的基本结构,社会形式出发。从中我们可以得知:个人具有哪些可能

性?哪些个性形式是合适的(至少当你不想被认为是疯子的时候)?人们该如何作为?当你考察《资本论》第一卷的前两章之后,你就可以清楚地发现马克思是如何做到这些的了。第一章的标题是“商品”(不是商品所有者和商品生产者),在第一章中马克思没有分析人的行为,他把商品形式作为劳动产品的特殊形式来分析。他谈到一些范畴,诸如使用价值、交换价值和价值实体,等等。第二章开始于他的名句:“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场去,不能自己去交换。因此,我们必须找寻它的监护人,商品占有者。”马克思安排得很清楚:首先他分析“关系”(第一章),然后依据这些“关系”分析人的行为(第二章)。同时,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他 与斯密、李嘉图以及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歧。他们(的分析)从“行为”开始,这种分析尚处于《资本论》第二章中(所说的)“抽象”的水平上。你可以把这种分析与马克思对于商品的分析(在此马克思对于商品形式、价值形式的分析是在其他地方都看不到的)进行对比。

采访者:但这些形式也是人类活动的产物。

海:当然,社会不是从天国掉下来的。我们都在生产社会,但我们是 以特定的方式进行这一生产的,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生产社会。科学分析必须从“形式”开始,这不是因为“形式”在时间上已经先存在着,而是缘于一种“逻辑优先”:理解特定的社会形式就可以理解个人的典型行为,而从个人的行为出发并不能理解“形式”。要不然我们就会把这些形式看成是理所当然的,而看不到这些形式本身必须得到解释——这正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干的事情:他们从进行商品交换的人们 的行为出发进行分析,但是他们没有看到商品形式本身就需要解释,他们把商品形式看作是一种自然形式(这正是马克思在“商品的拜物教性质”和《资本论》第三卷的末尾“三位一体的公式”的标题下所作的分析的基本点)。

采访者:那其他的决裂呢?

海:我们刚才谈了(马克思)与“人类学主义”(把一种特定的人类学当作“自然的”来接受)的决裂,与“个人主义”(企图经由个人来理解社会)的决裂。第三个决裂就是与“经验主义”的决裂。当然,马克思引用了大量的经验资料,比当时的其他经济学家中的大多数都要多。对于资料,他近乎痴迷。但是我所谓的“经验主义”,指的是与资料的使用不同的、别的东西。它是这样一种论调:社会是一种清楚、透明的东西,只要你精确地观察,就能看得一清二楚。这种观点马克思在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和《共产党宣言》里都提到过。在《资本论》中,马克思强调:你能看到的只是表象,但内核我们却看不到;你必须去揭示这个内核,必须去理解某些秘密,比如商品拜物教性质的秘密。在《资本论》中,马克思谈了很多有关“秘密”或价值的“超自然”特征的话题。这些概念并非古怪风格的表达,而是力图使不透明的资本主义社会透明化,而这种不透明性却被经验主义忽略了。因此,《资本论》的基本概念,如“价值”和“剩余价值”,都是“非经验的”概念。你能以一种经验的方式观察到价格、利润、利息率和租金。但是价值和剩余价值不是这种意义上的经验概念。马克思用非经验的概念来解释经验的行为,这是马克思与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又一重大差别。

采访者: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不是与李嘉图的剩余价值概念关系密切吗?

海:在我的第一本书《价值科学》中,我在一些方面批判了马克思对李嘉图的高度欣赏。李嘉图并没有真正的价值理论。当李嘉图使用“价值”这个词时,他谈及的都是以平均利润率的存 在为先决条件的交换关系。因而,李嘉图的“价值”所指谓的就是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第三卷中所说的“生产价格”。然而,没有真正的价值理论的李嘉图,也没有真正的剩余价值理论,他所处理的仅仅是平均利润。

采访者:但是李嘉图提到了价值,谈论了价值。

海:李嘉图使用了“价值”这个词。可是当你考察它所描述的“价值”时,(你会发现),它迥异于马克思所描述的价值。当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的开头分析价值时,他并没有对资本作特别的假定,也没有以一般利润率的存在为先决条件。恰恰相反,价值理论的严格应用会导致不平等的利润率——这一结果与利润率均等化(问题上)的经验主义取向是矛盾的。但是,允许这一均等化,价值必须转形为生产价格,简言之,这就是《资本论》第三卷第二篇的由来。而李嘉图使用“价值”一词时,他始终被“生产价格”(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)所束缚,因为对他来说,资本始终是与平均利润率相关联的。而当你注意到李嘉图在其第一章所讨论的那些问题时,你就会发现,这一点是很清楚的:他始终把平均利润率作为资本的先决条件。如果资本伴随着平均利润率,那么交换就不以价值为依据,而是以生产价格为依据了。(下转 A3 版)

采访者:海里希教授,您好,能否首先请您向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学术背景情况?

米歇尔·海里希(以下简称“海”):我的第一本书是我的博士论文《价值科学》。该书初版于1991年,后经过相当大的扩充于1999年再版。这部著作,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的广泛讨论之后,确定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规划独特科学要点的一个尝试。我致力于发现“区别”:一方面是青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的区别;另一方面,是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的区别,以及马克思与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别。我想对马克思全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规划进行这样的描述:它不仅意味着为既有理论增添一个新理论,而且是对全部的经济学科学进行批判,从而清楚有力地表达一种经济学的革命。但是,在马克思的这个规划中,你会发现一些矛盾心态:一方面,马克思同旧有的经济学领域实现了决裂;另一方面,他的一些探究仍然囿于这些旧有领域,且他对此浑然不觉。同旧有领域的决裂、分离,与身陷于这些领域,同时发生,这导致了马克思理论中的一些问题,如众所周知的“转形问题”。我认为,从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形问题,是马克思同旧有经济学领域的决裂不彻底的产物。它事实上不是马克思的新理论,它是由马克思业已批判过的旧原理与新原理的混合而产生的。

我还为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三卷写过解读,即《政治经济学批判:导读》。

《导读》是为那些对《资本论》还不太了解 的读者而写的。它不仅指引读者学习《资本论》三卷本,而且阐述了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。它 以我在《价值科学》一书中提供的材料为基础,因 而它突出了一些问题(比如拜物教)。2004年,《导读》的第一版问世,从那以后每年都再版。在德国,它成了流传最广的《资本论》的导读。2008年,西班牙语译本问世,现在英译本也即将完成。

我的第三本书——《如何阅读马克思的〈资本论〉》(Wiedas Marxsche Kapital lesen)——在某些方面是第二本书的续篇。它是为那些想更加深入地了解《资本论》的读者而写的。这本书对《资本论》第一卷前两章(“商品”章和“交换过程”章)的内容,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解说。对于这两章,我几乎对其每一句话都加以注解。这两章对理解《资本论》不仅极其重要,而且,当你真正试图去掌握其全部内容,而不是将其内容归结为关于价值和劳动的几句简单命题时,又非常难懂。

在对前两章的注解中,我还把马克思的其他文本作为附录加了进来,这些文本与理解马克思对于商品的分析是相关的。其中一篇取材于所谓“修订手稿”(这个手稿是马克思为《资本论》第二版的出版而对第一版所作的修订)。在此“修订手稿”中,你会发现关于商品分析的方法论思考(马克思的一种自我注解)。其他地方的阐述都不如这里的清楚,而且它迄今只在MEGA2中公布于世,还尚未翻译成其他语种。在收录这份手稿的MEGA第二部分第6卷中,你可以发现马克思进行了何等深入的分析,改变表述、增添内容是多么地频繁,一遍又一遍地修改、等等。

采访者:您的这两本书都是基于MEGA2版本?

海:我的第一本书就是基于MEGA2版本的;甚至在我1981年完成的学位论文中,我也利用了MEGA2的资料。至今,我利用MEGA2从事研究工作已经30多年了。如果你想对马克思有一个真正科学的探讨,如果你想对他的思想进行深入的考察,你就需要MEGA2提供的所有资料。

采访者:在《重读马克思》这本书中,您的论文的标题被翻译成“重建”或“解构”,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,您将它们并列,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?

海:这个标题的确有点挑衅的意味。当你回顾20世纪上半叶有关马克思《资本论》的讨论史的时候,(就会发现)当时的人们认为,有了我们所知道的《资本论》三卷本就基本上足够了。除了有些读者把“剩余价值理论”当作第四卷的替代品之外,关于“理论史”的第四卷被忽略了。在20世纪60年代,人们读了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》,读了《资本论》(第一卷)第一版(这一版与我们经常阅读和翻译的、后来的版本有相当大的差别),一场新的讨论在许多西方国家开始了。人们意识到,马克思的初始计划——“六册计划”——比《资本论》三卷的内容要广泛得多。在20世纪70年代,尤其是在西德,又掀起了一场关于重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讨论。过去被视为完成的东西,现在被看作是未完成的,因而我们必须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“重建”。

但是,“重建”的设想是以设计好的计划业已清楚地存在为先决条件的。然而,事实上它并不那么清楚。比如,数十年来我们都知道,恩格斯用以加工成《资本论》第三卷的手稿是最早的手稿,而恩格斯用于《资本论》第二卷的八部手稿中有些成文要晚一些。

第三卷的手稿在一些问题上的见解,在

论证水平上还没有达到第一卷和第二卷的相关部分那样的高度。因此,第三卷不是在这里或那里增加点东西就能完成的,我们必须对其有些方面(比如危机理论和信用理论)进行重新设计。而这也正是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的计划。这一点,我们是从其信件中,尤其是给丹尼尔森(他一遍又一遍催促马克思出版第一卷的续篇)的信中得知的。不久以后,马克思在1881年写给丹尼尔森的一封信中表示,他甚至打算重新设计第一卷。马克思依然处于研究的过程当中:无论是表述过程,还是研究过程都没有完成。当我们谈及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时,所有这些都必须浮现于脑海。因此,我使用了带有挑衅性的“解构”一词。我想打破对《资本论》的这样一种理解:尽管其表述并未完成,但它的计划已经如此清晰,以至于我们可通过把单个的元素进行组合来重建整个计划。这个可能的“重建”想法,正是来自我要批判的。

我必须以一种与“重建”打算不同的、另外一种方式来对待《资本论》。而这对我们使用MEGA2第二部分的准备性手稿也有影响。在这篇文章中我也批判了MEGA2的编辑们,因为他们谈论什么“《资本论》的三个手稿”,认为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》(1857—1858)是第一个手稿;《1861—1863手稿》是第二个手稿;《1863—1865手稿》是第三个手稿,其中部分内容由马克思(第一卷)和恩格斯(第二、三卷)编辑出版了。与这种观点(连同其他很多观点)相反,我认为,我们必须把马克思的两个不同的计划区分开来:六册计划,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》是其第一个手稿,《1861—1863手稿》是其第二个手稿;然后是作为一个新计划的《资本论》四卷计划,《1863—1865手稿》是其前三卷的第一稿,第四卷根本就没写(“剩余价值理论”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计划)。而后还有大量资料,其中有些部分出版了(《资本论》第一卷的德文版和法文修订版),而更大的部分并未出版。我认为,《资本论》第二手稿由以下部分构成:第一卷的第一版本(1867),马克思写于1868—1869年的第二卷的第二稿,与第三卷开头相关的一些小的手稿。第三个草稿由以下部分构成:“修订手稿”(1871—1872),第一卷第二版,关于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的数学手稿,以及写于19世纪70年代的第二卷的手稿。总而言之,我不赞成MEGA2的编辑们关于《资本论》的三个手稿和几个已经出版了的版本的观点。我认为,有两个不同的计划:第一个计划(两个手稿);第二个计划(三个手稿,部分地出版了),但是没有 一个最终设计。

采访者:米歇尔·克拉特克(MichaelKraetke)也出版了有关《资本论》和马克思经济理论发展的著作,您如何看待他的观点,你们两人的观点是相同还是相异?

海:在某种意义上,我们的观点差别很大,并且相互批判。

采访者:这样,就有不同的阐述。我想知道,您和他讨论问题的各自基点和依据是什么?

海:对于马克思的著作,我们所持的观点不同,因而依据只能在这些文本(texts)中找到。

采访者:这意味着,不同的人可以对同一文本作出不同解释?

海:是的,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。接着,我们必须讨论哪种解释与文本更接近,哪种解释能覆盖更多观点。例如,我与米歇尔·克拉特克有两个有争执的领域,其中一个 是,他否认1857年以后存在着两个不同的计划。

采访者:他只是谈论“六册计划”的变化吗?

海:是的,他看到了很多续篇,一些较小的变迁,但没有看到两个不同的计划。我们之间的另外一个分歧是对于下述问题的不同回答:马克思《资本论》的原始手稿与恩格斯编辑的版本之间的差别究竟有多大?作为马克思手稿的编者,恩格斯设法把资料整合起来,使之具有可读性,但是要做到这一点,他也强调或是改变一些东西,比如第三卷的大部分章节标题出自恩格斯之手。在很多点(points)上,恩格斯编辑出版的文本与马克思的手稿之间有相当大的差别(不仅仅是文体方面)。克拉特克却把这些差别给忽略了,在《马克思恩格斯年鉴》写的一篇文章中,他写道:它们之间几乎没有差别。但是查阅MEGA2,你可以发现很多差别。我认为不同的解释依赖于不同的估量。

采访者:那么您在此提出的估量是什么意思呢?

海:估量意味着把不同的重要性给予某个特定的点(point)。比如,如果我们把马克思《资本论》第三卷手稿中的一段与恩格斯编辑的文本作比较,我们就会发现其中的差别。在某种程度上,这是一个评判,估量差别是否有重大作用的问题。一点,非常清楚,我们能达成一致,但是有些点,依据不同的评判,我们得出了不同的结论。

采访者:如此说来,这意味着,迄今为止